



【文化杂谈】

春节： 不离不弃的天地约

□于丹

一年之中的所有节日里，春节是最大的。曾经有美国朋友问我，你们冬天里过的节为什么叫春节呢？我告诉他，春节就是在最寒冷的日子迎接春天，向春天致敬的节日。寒冬腊月，正是大地休耕之时，辛劳一年的人们回家猫冬了，从心情到身体都需要温暖，所以中国人一定要在最冷的日子过春节。

冬天的“冬”字，《说文解字》上解释为“四时尽也”，四季走到尽头了，很多事情也该有个终结了。所以，“冬”字上面的那个反文，从甲骨文字形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，其实就是结绳记事时两头打的绳结；底下的两个点，是冰冻的河面上嘎嘎地爆裂出来的两点碎冰纹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大地都休眠了，厚厚一层雪被子滋润着田地，等待着明年春雪复苏。这个时刻，人不回家过年，还能干点什么？所以，外面越萧瑟，家里越红火。

童年记忆中的春节，最基本的颜色一定是艳艳的中国红。孩子们穿上大红的棉袄，大红的棉鞋，姑娘们缠上大红的头绳，窗户上贴着大红的窗花，房门上贴着大红的对联，挑着大红的炮仗……那些大红灯笼穿越岁月，到今天还能望得见映红人脸的那点温暖。所有的红红火火的事物，在最萧瑟的季节里，让人心里洋溢着红红火火的温暖，那真是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

春节是一年的节点，流水一样的日子，到了年终应该来一次盘点。所以，节日和假日不一样，假日纯粹用来休息，但节日会有一些象征的意义。为了祈福，人们在门上贴福字，有意思的是，这个菱形福字基本都是倒着贴的。它的四个角代表着东南西北，四个边代表着东北、西北、东南和西南，这样倒着贴，才叫四面八方福到了。中国人的观念是“天圆地方”，大红灯笼是方的，大红灯笼是圆的，一圆一方之间，中国人的天地就在自己的家门之内了。

我喜欢过春节时那些隆重的老礼，真是把一年的年光当成一回事儿。腊月二十三祭灶王，我们都吃过脆脆的糖瓜，吃到最后还黏黏地粘牙。这本来是给灶王爷吃的，为了让他上天言好事，别提平常犯的那点小过错。想起这件事就觉得温暖，过去的人心里得存着多大的敬畏啊，做一点无心的错事，都生怕灶王爷、灶王奶奶上去告诉了天神，所以买些糖瓜祭灶，黏住他们的嘴，让他们嘴甜点儿，明年会小心注意，不再犯错就是了。那个时候的人虔诚，本分，远远没有现代人这样狂妄自大。当人不再信天的时候，可能也就不再信自己的天良了。

我还喜欢春节前的洒扫厅厨，人们一定要赶在大年前洗掉所有的衣裳。从前没有洗衣机，媳妇、姑娘在大木盆里洗衣服，手冻得通红通红，在搓板上一下一下搓起肥皂泡沫。爱干净的人家即使没有脏衣服，房子里也没有那么多灰尘，但同样要洗衣服、打扫房屋，为的就是那种过大年的仪式感。那样的隆重是已经久违的庄严。

过年时最重要的一项家庭活动，大概就是包饺子了。我现在还能想起来那时的情景，大年三十的下午，婆婆就带着妯娌、媳妇们开始切肉、拌馅、和面、擀

皮；老爷子抽着烟，姑爷和儿子陪着喝茶、聊天；小孙子、小孙女们掐一块面捏个小白兔，再拿一块面，用筷子歪歪斜斜地擀个皮，往里面包块水果糖。

终于熬到年三十除夕夜，鞭炮声四起，家家户户都有不可或缺的那一个大礼——吃饺子。“饺”字的右边是个“交”，左半边的食字旁代表食物。其实，饺子最早时叫“交子”，交子就是指除夕和大年初一在子时相交的那一刻。守岁的人带着憧憬，带着忐忑，带着欢喜，带着惆怅，虔诚地守望着新年的到来。那种充满了虔诚与恭敬的守望，至今想起来依然让人怦然心动。

当新年的钟声敲响，放过了鞭炮，人也就饿了，热腾腾的饺子就上桌了。除夕夜的饺子宴是讲究流水席的，锅里的水开了，婆婆带着妯娌、媳妇们去下饺子，当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姑爷、儿子陪老爷子喝着酒，小孙子、小孙女围在旁边，跟爷爷说，饺子酒，饺子酒，越喝越多。中国人的那点红火劲儿，其实就在这一桌饺子宴里。现在很多人家过春节，已经不再亲自动手包饺子了，吃的是超市买来的，各种口味的速冻水饺，也就找不到那种手工的味道和团团圆圆的仪式感了。

过春节也是走亲访友的最好时机。平时因为忙碌而忽略了彼此的那点歉疚，因为有个小过节却不好意思张口的那点歉意，都可以在这个时刻欢欢喜喜地拱拱手、拜拜年，感情一下子就回来了。我每到过年时，除了走亲访友，也会去拜望我的师长。

我的导师聂石樵先生和师母邓魁英先生，现在都已经年过八旬了。在学术研究上，聂先生专攻先秦两汉、魏晋南北朝文学，邓先生专攻唐宋文学，都是学界著名的教授。我当年读书时就常去导师家，而现在，我的女儿都已经能自己跑去看他们了，这中间跨越了二十多年的时光。师生之间的情谊，早已变成了浓浓的亲情，所以，我的女儿一直管他们叫姥爷、姥姥。而每年过年时的聚会，更是我春节里最温暖的记忆。

以前的时候，聂先生总会说我要孩子太晚，等我终于生了孩子，老两口乐得眉开眼笑。记得那一年春节，我抱着半岁的孩子上门拜年，还在他们家的里屋给孩子喂奶。师母拿出了她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，那是她用各种彩色毛线精心编织的一件小毛衣，比巴掌大不了多少。毛衣是套头的，左肩膀上有三个小小的按扣，她说，这样的套头毛衣，孩子穿着才舒服，按上按扣，脖子不受风，前后襟没有纽扣，不会硌着孩子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春节，我的女儿总

会收到一件师母亲手编织的小毛衣，一年比一年大一点儿，一年换一种图案，有的是小猪，有的是小兔，有的是妈妈领着宝宝，有的是风景图。每一次织毛衣，师母都要专门去找一本图案书，挑选出满意的图案，然后织啊织啊，从天还未寒时一直织到秋风萧瑟，又织到初雪飘零，织到我上门拜年的那一天。年复一年，渐渐地，她织不动图案了，开始用不同颜色的彩线拼条纹。

再后来，她有一天伸着因为风湿而变形的手指，叹着气跟我说：“我现在眼神儿不如从前了，这个手怎么那么不听话，勾毛线用的劲儿都不匀了，我真不知道给孩子织的毛衣还拿不拿得出手。”尽管她嘴上这么说，到了下一年，孩子的毛衣还是会等在那儿。

从第一件开始，师母给我女儿所织的每一件小毛衣，我都精心地保留着。女儿在春节时收到过很多漂亮的芭比娃娃、巧克力和糖果，还有各种漂亮的裙子，但只有师母是用手工的方式，一针一线来娇宠、疼爱她的。这一件件的毛衣，都是无价的，因为它编织的是祝福，是隔代传承的爱。这其实才是春节真正的意义。

节日是一种精神的仪式，有着深邃的守望意味。春节，是我们对伦理和土地的认同，是我们内心反省的契机，是我们送出问候和祝福的最大理由，是我们宠爱自己、调整身心难得的留白时光。春节，是对过去的归零，是对未来的开启，是值得庄严相待的节日。

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里，春节让我们心中洋溢出温暖，升腾出希望，恰如一个“春”字——太阳从地下渐渐苏醒，小草逐渐发芽，拱出地面，向天空致敬。春节，迎接的不就是这样一个个起点吗？

如今，中国人过节的方式越来越多元了，年夜饭可以在酒店里吃了，一家人也可以旅行过年了，拜年可以通过短信、电话了。但不管怎样，那些过年的仪式感和规矩都不应该被忽略。祭拜灶王时的虔诚敬拜，洒扫厅厨时的琐碎认真，全家包饺子时的其乐融融，大年初一走出家门时的鞠躬拜年，只有把节庆本身的意味都过出来，这个节日才能真正留在我们的心里，成为节序如流中那一份值得眷恋的乡土情思，成为让我们开启新希望的契机。

按照传统观念，一过春节我就进入古稀之年了。借此机会，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感悟，也是一件愉快的事。

一、心态从容的父母，给了我无拘无束的童年。

我是1946年出生，1952年入学的。开学后的一个星期天，父母要检查我的作业，但我就是不让，他们只好放弃。从此我进入了信马由缰、无拘无束的时代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几乎都要看一场电影。我把电影票保存下来，一个月居然攒了26张。去掉四个星期天，平均每天看一场。

那时候电影院不仅有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大陆影片，还有香港地区影片和译制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些影片对我的

【人生随想】

七个十年，七点感悟

□智效民

思想感情，是非观念，审美情趣都有积极的影响，这是课堂上不可能学到的。

二、广泛的阅读兴趣，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。

上了中学以后，我对数学比较重视，对语文不感兴趣。初二期中考试，我的语文只有38分。所幸我喜欢看长篇小说，作文还说得过去。不久遇上教育改革，要求语文考试以作文为主，这才让我渡过难关。

后来我认识到写作是一种重要的能力，即便是数学家，也需要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，何况万一当不了数学家，或许还能依靠写作维持生计。

三、不怕年少轻狂，就怕缺乏正确的分析判断。

1964年高中毕业后，我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能进入大学，便主动下乡插队，想以此证明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”的愿望。但下乡以后我才发现，主动放弃城市户口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，而农村的情况与当时的宣传也不是一码事。

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坚持读书，等待机会。苦熬七八年以后，我才回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。当时父亲问我：“你不是不想当小学老师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今天当了小学老师，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，后天就能当大学老师。”

话虽狂妄，但是我有自己的分析判断：当时大学一直停办，所以“教师荒”很快就会从小学蔓延到中学、大学里去。

四、人生需要不断调整，不断充电。

没过几年，我就跳槽进入一个工厂子弟中学。因为文科可以自学，数学却不大可能，所以我放弃数学家理想，当了一名语文老师。

当时“文革”尚未结束，学校非常混乱，这正好给了我足够的读书时间。那时候除了“手抄本”之外，还有内部发行的“黄皮书”、“灰皮书”、“白皮书”在坊间流传。这些书让我大开眼界，并对国外情况和文明走向有所了解。

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我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，但因为没有人“拜码头”，所以名落孙山，未能如愿。这次考试虽然失利，却让我找到了研究方向。

五、要想有所得，必须有有所失。

直到40岁那年，我才凭借一个偶然机会进入山西省社科院。一开始，我还想通过写论文、做课题获得同行承认，但很快就发现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存在严重腐败。

于是我开始致力于随笔写作，并为自己立下“不写论文、不做课题、不参加评奖”的“三不主义”。这样一来，我虽然在职称评定和工资待遇上受到很大影响，在思考、研究和写作方面却获得解放。甘蔗没有两头甜，要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。这也是我在不惑之年的一点感悟。

六、做学问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

因为这些学术随笔在报刊发表后反响不错，所以就有出版社愿意将它们集结出版。这些年我先后出版十几本书，其中《胡适和他的朋友们》和《八位大学校长》（后改名为《大学之魂：民国老校长》）不仅一版再版，还被读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奖中评为“推荐之书”。我虽然以“三不主义”自律，但这个奖项是读者给的，所以我欣然接受。

做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，所谓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，现在许多学术单位却用“鞭打快牛”的态度对待年轻人，不愿耕耘，只问收获。结果是拔苗助长、毁人不倦。这恐怕是当今社会的通病。

七、忘掉死亡，忘掉年龄。

退休以后，我除了继续写作外，还去香港访学，到台湾开会。去年我又在北京、南京、宁波、绍兴、南昌、温州和山西等地参加读书沙龙，与读者聊个人经历和治学经验。这几年我还多次跟团出国旅游，虽然不大自由，却也开阔了眼界。

此外，我61岁学车，64岁买车，如今已经是老司机了。我想开车主要有两个原因。一是为了享受汽车文明，二是为了拓展生命的宽度（长度无法控制）。有车以后，我不仅多次往返于北京、太原之间，还去过承德、围场、秦皇岛、北戴河等地。

最后，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多去一些国家和地区，以便实现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的愿望。

